

論宋初邊塞詩主題之移易與 寫作手法之開拓

梁評貴

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生

提 要

本文扣合宋初的時代背景，檢視主題重心的移易及寫作手法的開拓，發掘宋初邊塞詩的特質，主要共有兩個方向。第一，以主題而言，宋初邊塞詩已具有表現平和靜定風格為主要的作品，創作者的視角轉向邊塞的其它方向，排除戰亂與羈旅，邊塞的自然風貌也有重新被創作者審視的可能。此外，部分的作品，創作者在詩的敘述中佔據話語權，展現我族優於異族的意識，最終至衍伸成使北詩華夷優劣的偏執。第二，就寫作手法來說，詩的形象思維成分降低，議論性及紀實性的表現開始出現，融入類近散文的表達方式，這與後來宋詩以議論為詩，以及使金詩中專以紀錄見聞為表達的手法，或能相互呼應，連接成相續的脈絡。顯示宋初邊塞詩包含了相對多元的可能性存在，許多後來在宋詩中成為主流的詩學風格，在宋初邊塞詩中已經可以略見端倪。

關鍵詞：宋初 邊塞詩 華夷之別 議論性 紀實性

論宋初邊塞詩主題之移易與 寫作手法之開拓

梁評貴

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生

一、前言

詩歌發展至宋代，已漸由唐人重視情景交融的風格情韻，轉移到宋人講究理致思辨的理性議論，若由唐轉變至宋的時間軸上來看，宋代初年的詩歌，應佔有特色轉變的關鍵地位，其中應有某些元素，為後來的宋調開啓了先河，或在由唐過渡至宋的過程中，包含著相對多元的可能性存在。本文的意圖，在擺脫過往詩歌風格體類的切入視角，轉由針對單一題材的演變進行考察，透過對宋初邊塞詩^①的研究，檢視邊塞主題的發展，考究描寫手法的新創、書寫重心的轉換等元素，以顯示詩歌發展的軌跡。本文所切入的視角，預計可得到與過往不同的兩種面向，一來得以由邊塞詩切合當時的政治情勢，討論文化轉型肇發的端倪。二來，

① 邊塞一詞的使用，據現存史料而言，最早出自司馬遷：《史記·三王世家》，用以指稱以中原政權為核心的國家邊境設防之地，後世史家相續延用，指涉對象亦不出此範圍，隨時間發展，各朝代政權所及的實際邊境雖有不同，然而邊塞一詞之指涉，已不脫以中原政權為核心，政治權力輻射至國家所能掌管的最遠邊境，並兼有以軍事武力，防禦相對於中原民族的異族為主。據此，則邊塞詩即指透過詩的形式，表現邊境設防之事，若進一步分析邊塞題材透過詩歌載體所帶來的質素，則具體可呈現為從軍出塞、遣使紀行、守土鎮邊、傾訴閨怨等，依此定義，其上限應可上溯至《詩經》，下限亦可擴及於當代。由此可知，邊塞詩不應獨為唐代所專有，而是擴及各朝代，在相類似的題材下，隨著國勢、文化、社會價值觀，乃至詩歌藝術標的準則之變遷，所反映出各有千秋的審美樣態。（臺北：萬卷樓圖書，2010年5月），卷60。

以邊塞詩的研究史而言，目前對唐代邊塞詩的研究已是相當充足，至宋亦有張高評等人相繼開拓，指出宋邊塞重紀實，重思辨議論等特性，與唐代邊塞詩描繪風情，抒展個人抱負相當的不同，然而由唐至宋究竟為何轉變？如何轉變？在詩歌藝術表現上，轉變的發端又是什麼？這些問題仍在邊塞詩的研究史上懸而未解。

目前與邊塞詩有關的研究成果，由漢至唐，已蔚為大觀，早期何寄澎《唐代邊塞詩初探》^②從歷史原因歸納唐代邊塞詩的起源，並認為邊塞詩最能夠表現唐代，唐代的歷史環境，也利於產生邊塞詩，在此前提下推論，至唐以後無邊塞詩，甚至唐以前之邊塞題材，亦僅為形成真正邊塞詩的助緣之一，而非完整且發展成熟的邊塞詩。所幸邊塞詩研究的發展，並未因早期的論點停滯，王文進在《南朝邊塞詩新論》^③及《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④與田曉菲在《烽火與流星》^⑤均共同指出邊塞詩的想像性、虛構性，注意到文學本身擁有虛構的特質，而不落入詩人必得行經邊塞，鎮佐戎幕之經驗主義的限制中。後閻福玲出版《漢唐邊塞詩研究》^⑥，對邊塞詩做了狹義與廣義的定義，但無論廣狹，都不脫邊塞詩與書寫守土鎮邊有密切的關連，同時又可以因邊塞的「要塞」之義，與其他書寫征戍題材的作品劃分開來。閻氏雖將研究的範圍限縮在由漢至唐，但因其定義邊塞詩是以詩敘述歷代守土鎮邊之作，在實際的論述中，已將研究邊塞詩的視野擴及先秦，相對於早期研究，論述的範圍已更為完整。

上述梳理邊塞詩的研究脈絡來看，可獲知兩項訊息。其一，邊塞詩定義之擴展，已不僅限於唐代，而是以題材性質作為研究範圍的考量，可研究的界域已跨及整部中國文學史。其二，透過對邊塞詩起源的考索，重新體認到文學本身具有虛構性，詩人可以運用想像力，跨越時間、空間，在各種交際或宴飲場合進行創作，未必是由自身實地經驗出發的邊塞題材，擺脫了以經驗主義為前提的視野。

② 何寄澎：《總是玉關情——唐代邊塞詩初探》（台北：聯經出版社，1978年6月）。

③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2月）。

④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台北：里仁書局，2008年6月）。

⑤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

⑥ 閻福玲：《漢唐邊塞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8月）。

關於對宋代邊塞詩之研究，張高評已在《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⁷一書中以〈使遼詩之傳承與邊塞詩之開拓〉、〈使金詩之主題與邊塞詩之轉折〉兩篇文章有所討論，並以此為《宋代邊塞詩研究》計畫之成果，闡發宋代邊塞詩基本的雛型。但因其研究範圍限縮於「使北」，先考察使遼或使金的詩人名單，再進一步觀察其描寫邊疆胡地的詩作為主要範疇，將這一類的作品與唐代邊塞詩的特質相比，得出兩者的異同。

但這樣的研究方式仍有不小的限制，共有兩點，第一，是研究範圍的對應問題，無論是使遼詩或使金詩，都不能直接等同於邊塞詩，若選取相對小的資料範圍，與相對宏大唐代邊塞詩對比，並歸納得出唐宋邊塞詩銜接與創變的特點，尚有許多不足，在研究範圍的對應上也不相稱。第二，延續第一點論及的前提，這兩篇文章的研究，在研究資料的選取範圍上，採取了以小見大的方式，但顯然將論述範圍聚焦於具有「出使經驗」的詩人當中，忽略了鎮佐邊關的詩人對於邊關之書寫，以及無出使經驗，純在中原內地透過想像虛構書寫邊塞者，更遑論文學史中良人遠征，表述閨怨的書寫模式。整體而言，張高評的成果雖開啓了宋代邊塞詩的研究起點，但仍過於著重詩人「實際親身」的經驗，未慮及文學本身的擬代、宴遊交際等，所帶來的虛構性想像。

本文預計扣合宋初的時代背景，檢視主題重心的移易及寫作手法的開拓，將研究的範圍從出使紀行的經驗主義中擴展出來，發掘宋初邊塞詩的特質，考察宋初邊塞詩與整體宋詩發展相續的可能性。在主題重心的變化上可分為兩點討論，第一點是平和靜定的風格呈現。第二點則是華夷之別的深化過程。在寫作手法上，則為紀實性的增強及議論性的加重。顯示宋初詩人透過主題重心的更動，寫作手法的變異，即使在未有明確自覺的情況下，替邊塞主題的書寫，乃至於後來的宋詩，做了轉換的先行。

⁷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4年11月）。

二、主題重心的移易

宋初從太祖至真宗，對來自北方民族的威脅，政策上一面採取與邊境建立友好的邦交關係，另一面則伺機而動，企圖收復在五代時期被割據出去的燕雲十六州，處於又戰又和的矛盾關係中。^⑧自宋太祖立國以來，北方邊疆的契丹、黨項人在軍事的結集規模，以及文化水平均已相對於唐之時有所提高，同時更懂得有效利用與漢族結盟的方式，以政治的斡旋談判，取得相對優勢，並以迫使漢族歲貢與征伐並行的手段，籌措自身內部發展的資源，已不能與早期游牧民族等同視之。^⑨因此，終宋之世，與外族之間的政策發展，則成為當時知識分子不能迴避的

⑧ 宋代初年的對外政策走向，自宋太祖面對契丹與北漢政權的聯合，開啟了與遼之間的後續戰爭，甚至在北漢覆滅以後，宋朝仍持續與契丹對峙，並在政策上擺盪在和戰之間。隨著戰爭局勢的演變，太祖時期對契丹的征伐多次取得勝利，且契丹與當時北方各部族，均有遣使來貢，宋王朝呈現出強盛擴張的氣象。但自太祖以後，太宗與真宗二朝，決議征伐北方卻屢屢戰敗，使得對外政策在短短數年之間，不得不因政治的情勢而兩面擺盪。如，（元）脫脫等撰：《宋史·本紀》第1冊：「太祖八年春正月甲戌朔……己亥，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書來講和。……甲子，契丹遣使耶律烏正來賀正旦。」在宋太祖與北漢、遼的戰爭中取得優勢後，遼曾一度遣使講和，並來賀正旦以表兩國交誼。但在此後，的太宗與真宗二朝，太宗曾多次決定與遼展開攻防，但多次戰敗，如太宗三年，鎮邊名將楊業戰死：「會契丹十萬眾復陷寰州，楊業護送遷民遇之，苦戰力盡，為所禽，守節而死。」至真宗時期景德元年，遼大舉南侵，迫使真宗在寇準的建議下親征，進而取得勝利，簽訂了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自此兩朝議定疆界，以白溝河為界，互稱兄弟之邦，並開啟了後續穩定歲貢的邦交模式。（臺北：中華學術院，1972年11月），頁16-66。

⑨ 此一時期，契丹人已懂得利用漢人內部的矛盾分裂，進行外交策略，換得相對應的政治籌碼，如據（宋）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紀載：石敬瑭引契丹為援，企圖奪取後唐天下。並稱臣於契丹皇帝，與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禮，並協議在事成後割讓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的土地。石敬瑭叛唐後，耶律德光封其為晉帝，每年向契丹交納帛30萬匹，並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這十六州是：幽（遼升為南京，亦稱燕京，即今北京）、涿（河北涿州）、瀛（河北河間縣）、莫（任丘）、檀（密雲）、薊（薊縣）、順（順義縣）、蔚（蔚縣）、新（河北原涿鹿縣）、媯（懷來縣）、儒（北京延慶縣）、武（河北原宣化縣）、朔（山西朔縣）、雲（大同市）、應（應縣）、寰（朔縣東）。此一政治情勢的形成，對後來建立的宋朝具有相當大的威脅。（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年10月），卷75，頁473-479。

議題，詩人的書寫策略，更與當時的對外態度密切相關。

此時的邊塞詩，直接呈現出與對外政策相應的主題發展，而與唐代有所不同，據閻福玲在《漢唐邊塞詩研究》中提出，由漢至唐的邊塞詩，呈現出大量誇飾表現邊地苦寒與征戍艱辛的作品，形成了漢唐邊塞詩的特色之一。¹⁰但由於政策擺盪在和戰之間，造成詩人在書寫邊關時的矛盾心理，帶給這一時期的邊塞詩兩種不同於漢唐以來的發展，其一是從行旅征戍之苦轉至書寫邊塞無事的作品開始出現，這與朝廷提出與民休息，不輕啓戰端的政策有所關連，詩人因此開始書寫邊塞無事悠閒之境況。其二則是延續過往邊塞詩中華夷之別的成分而有所加重，可與張高評在〈使遼詩之傳承與邊塞詩之開拓〉提出詩人加重了華優夷劣的成分有所銜接。此二種主題的轉移，構成了後來宋代邊塞詩中較理致平和的情調以及華夷之別的發端，以下即以這二類作品，論證宋初邊塞詩的前兆。

（一）平和靜定的風格呈現

邊塞書寫之所以形成，以及其何以表現出不同於其他題材的風格情調，取決於兩項原因，其一為地理環境的限制，客觀自然的地域性特徵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書寫者所直接選取的鮮明意象，廣漠無涯的黃沙以及冬寒夏熱的自然季候，直接影響來自中原地域寫作者的所見所聞，在書寫中構成了不同於其他題材的表現要素。其二則是主觀的人為視角，通常由國家政策方向的不同，或間接或直接的影響了中原文人看待北方的方式，書寫者的政治文化立場及其國族認同，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邊塞詩的題旨走向。以上兩項因素交互影響作用，在國家呈現奮進昂揚的狀態，且需要以民族本位的立場攻伐外族時，則文人多視異族為需要被征服的他者。但當中原地區的政權走向衰弱，進而向北方夷族表現出友好，且與之交誼的情況時，書寫者的角度即會偏向相對客觀的季候描寫。

因此，國勢的走向，決定了文人書寫時選取觀察到的自然意象，並融合長久

¹⁰ 閻福玲：《漢唐邊塞詩研究》：「漢唐邊塞詩中這類表現征戍苦寒的類似詩句俯拾即是，可以說，表現征戍的艱辛苦寒是漢唐邊塞詩的寫作重心之一，也是漢唐邊塞詩的詩藝特色之一。」，頁 128。

以來其文化所澱積下來對北方邊塞的認識，逐漸構成邊塞詩的寫作傳統。據閻福玲在《漢唐邊塞詩研究》所提出的成果，唐前邊塞詩的描述重點在襯托征戍主體的精神風貌，重表現而輕再現，詩人選取苦寒的環境展現將士征戰的意志，但這個情況，到了元明清，則轉為寫景詩與風俗詩。¹¹閻氏已觀察到漢唐詩人書寫邊塞時所挑選的氣候意象，捕捉到了征戍苦寒的特點，同時也已注意到由漢唐以來至元明清書寫特徵的轉向。但礙於其研究主題所限，未及開展至唐代以後的細部論證，而由漢唐至元明清的特徵轉向，宋正扮演主要的關鍵地位。

據劉攽《中山詩話》所載：「劉沆亦使契丹，館客戲為句曰：『有酒如澗，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迕之，二公俱謫官。」¹²這段資料顯示出自澶淵之盟以後，仁宗皇帝對遼不敢輕啓戰端，並特別以禮待之的基本態度。故宋初的邊塞詩，苦寒征戍的主題特質自是逐漸消退，詩人轉向描述邊境平和的穩定樣態。在政策的影響下，即使是傳統中與征戰主題最為相關的邊塞樂府，亦脫去慷慨激昂的壯烈之詞，染上平和靜定的色彩。如譚用之的〈塞上〉：

鉢略城邊日欲西，遊人卻憶舊山歸。牛羊集水煙黏步，鷓鴣盤空雪滿圍。
獵騎靜逢邊氣薄，戍樓寒對暮煙微。橫行總是男兒事，早晚重來似漢飛。¹³

該詩前兩句描述塞外的落日之景，鉢略本指西突厥的可汗沙鉢略，但後來泛指塞

¹¹ 閻福玲：《漢唐邊塞詩研究》：「從整個邊塞詩史看，唐前邊塞詩描寫邊景，意在襯托征戍主體的精神風貌，重表現而輕再現，通過苦寒的邊塞環境展現爭戰將士與自然的抗爭，以此表現英勇無畏不可戰勝的戰鬥意志和頑強毅力。而元明清邊塞詩多寫景詩和風俗詩，以客觀寫實為主，重再現而輕表現，因此邊塞詩的苦寒特色淡化，冷色調被暖色調和花色所替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漢唐邊塞詩與元明清邊塞詩相比，表現出鮮明的時代差異和不同的風格氣調。」，頁135。

¹² （宋）劉攽：《中山詩話》，吳文治等主編《宋詩話全編》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頁450。

¹³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卷3，頁38。

外，定位了詩的空間與時間設定，構成鮮明的景象，再帶入遊人思鄉的元素。人在邊塞，空間上與故鄉拉開極長遠的距離，且不能自由回到家鄉，從另一個側面暗示了遊人基於各種原因而身不由己，整體情調已相對落寞。後再拉開視角，將對人的敘述轉向其他方向，寫牛羊在水邊聚集，以及鷗鷺等猛禽在上盤旋不止，而此時的邊城已降雪，點出「寒冷」的質性。後再形容動態的騎馬行獵者，正逢如此蕭索的季節與氣氛，將行獵之人的動態，消溶於整體靜態環境的蕭條冷落，故此時駐軍的瞭望樓也在這落日的烟靄中顯得寒冷。

作者用大空間的靜定蕭條，將小範圍的打獵行騎動態包圍起來，由敘寫邊塞之景，營造孤清冷落的形象，因此最末兩句所指的男兒事與似漢飛，雖依然帶有建功立業的意圖在其中，卻已在作者前六句的情調營造中被大量削弱，整體的主軸亦已偏向邊地的景物描寫，男兒建功立業的心志，顯然已非本詩所呈現的重點，更與唐代詩人寫樂府〈塞上〉系列，漸漸產生了微妙的差距。

譚用之此人據《宋史·鄭起傳》紀載，生於五代末年，入宋後仕途不達，其生活的時間範圍約在石敬瑭建立後晉，至宋太祖乾德年間。¹⁴ 對應當時的政治局勢，在石敬瑭建立後晉政權後，到宋太祖的這段時間，邊關戰事相對減少，而宋王朝正初顯大一統的氣象格局，彼時雖未收復燕雲十六州，但宋太祖對契丹的戰爭可說是勝多於敗，甚至北方各部族，如女真、回鶻、高麗亦紛紛朝貢來服，太祖登基八年後，契丹更與宋停戰談和，開始遣使來賀正旦。這些政治事實逐漸對邊塞題材發生改變，開始呈現不同於以往戰爭殺伐，或嘆行旅苦辛的書寫模式。

〈塞上〉依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該題應為〈出塞〉、〈入塞〉系列發展至唐而有的新題，若回到唐代樂府的書寫傳統考察，〈塞上〉此一系列的作品，內容多敘述將士捨命征戰，或馳騁異域，克服自然環境，以建功立名為主體的調性，形成了共通的寫作模式。但此一主題，到了五代末至宋初的譚用之手上，轉以描述邊塞平靜景色為主軸，男兒馬上取功名的意識雖仍存在，但其建功立業的色彩，已相對淡泊許多，反較偏向對邊塞景緻的實景描繪，與過去的書寫方式開

¹⁴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1冊：「譚用之，字藏用。五代末人，善詩。入宋，仕途不達。」，卷3，頁38。

始產生細微的不同。

這時的邊塞詩，已漸蛻去男兒奮勇殺敵的開拓心志，偏重於以描寫邊塞景物營造荒寒意境，呈現邊關無事，冷落蕭條之氣象。此一情形，與譚用之時代相同的翁宏¹⁵，其作品也可以看見類似的現象。如〈秋風曲〉，由題名推測，翁宏所作的〈秋風曲〉應來自樂府〈秋風〉舊題，形式上已改為全為五言，省去舊題中第十三句三字、十四句四字的特点，全以整鍊的五言來表達：

又是秋殘也，無聊意若何。客程江外遠，歸思夜深多。峴首飛黃葉，湘湄走白波。仍聞漢都護，今歲合休戈。¹⁶

這首詩的主題也表現了類似的意境，前二句先點出季候是在秋天，並用秋殘一詞形容蕭條衰敗的景象，再由景進入人物的內心描寫，以無聊表無可奈何的感覺，並自問為何如此。後二句再承接自答，因詩中所述的主體，自身遠在中原以外的地區，客程指旅途生涯，江外應指地處長江之外，意即詩中主體旅途在外，因為各種原因無法返歸，離中原地區有著很長的距離，從此拉開空間的差距。書寫者利用文學的想像脫離現實環境的限制，想像此時峴山的黃葉應開始飄落凋零，湘水岸旁亦湧起白色波浪。但詩中的主體此時卻遠在邊關而不得返歸，在這思鄉的秋日蕭條情境中，聽聞了都護府¹⁷今年休戈無事的消息，使得原本應充滿建功立業的邊關熱情，轉向了平和靜定，蕭條疏落的情態表現。

此類的邊塞詩，已產生了羈旅於外，進而以描述邊關的季節景象，呈現蕭條冷落的氣象，所主要描寫的主題，已逐漸與過去的邊塞詩產生了偏移，以主體感

¹⁵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1冊：「翁宏，字大舉，桂嶺（今廣西賀縣）人。常寓居韶、賀間，不仕進。」，卷15，頁213。

¹⁶ 同前註，頁214。

¹⁷ 之所以推論詩中敘述的主體正處於邊關塞外，主要因漢、唐之都護府，除安南都護府用以管控越南一帶地區，後在西元九三九年吳權起兵攻伐南漢時，安南都護府即遭廢除。按翁宏生卒之時代，此時之都護府應指北方。除安南之外，其餘都護府均設置於北方，用以管控北邊的諸民族部落，分別是安西、安北、單于、安東、北庭。

受到「秋殘」、「無聊」、「思歸」為表現的主軸，有關戰爭的議題，則消解在「今歲合休戈」當中。與邊關塞外及戰爭最具相關性的詩歌題材，逐漸產生蕭條冷落的靜態氣息，若回歸到邊塞詩風格呈現的兩項因素來看，邊塞詩的發展與政治密切相關，而詩人選取的自然意象，固然受到邊塞客觀環境的限制，但其書寫的主旨呈現，則取決於外在人為政治形勢，因此在唐末至宋初的邊關戰事減少，此一政治條件，則具體影響邊塞題材所呈現的風格，漸產生不同於其他邊塞詩所具有昂揚奮進的情調。

隨著時序進入宋代，這一支不同於其他邊塞詩風格的作品，其偏轉的重心更往邊塞官閒無事發展，如張詠¹⁸的〈登麟州城樓〉：

莫問戎庭苦，高欄是夕攀。時清官事少，邊靜戍人閑。雉堞臨寒水，穹廬倚亂山。皇恩正無外，不擬更移關。¹⁹

這首詩由莫問邊關之苦開始，一反過往刻意由邊境冷落的景致，延伸描繪思鄉之苦，或征行之勞的敘述主軸。從詩中敘述者的自問，開啓一連串人在邊境的心情表達，以「時清官事少，邊靜戍人閑」，顯示了當時兩國之間正處於無戰狀態，也因為宋的對外政策，使得戍守邊關的存在意義逐漸被消解。當人為政局的干擾，將詩人選取邊塞意象的目光從戰爭轉開，則漸呈現一個相對客觀的自然風光，故作者直接寫雉堞短牆臨著水流，遊牧民族的穹廬則遠看似倚著背後的山景。其中更無征伐異族，開拓邊境的意氣，或敘述濃厚的歸鄉感情，或邊塞氣候之惡劣等主觀表述，僅是客觀呈現圖景，至此邊塞詩也有了另一個面向，與後來使金詩中的客觀紀行能相互銜接。這首詩的最後更扣回政策層面解釋，說會有這樣平靜景

¹⁸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1冊：「張詠（946-1015），字復之，號乖崖，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雍熙元年（984），遷著作佐郎。端拱元年（988），轉秘書丞。二年，通判相州。召還，之開封浚儀縣，出為荊湖北路轉運使。淳化四年（993），擢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台臺司兼掌三班院。五年出知益州。……六年，加刑部侍郎、再知益州……，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卒，年七十。諡忠定。」，卷48，頁520。

¹⁹ 同前註，卷49，頁531。

象，是由於「皇恩」，亦即國家的政策方針，帶來了邊塞和平的景象，也讚頌太宗無「移關」開拓邊界的意圖，使得兩族皆能受惠，說明皇恩的浩大無外。

張詠雖生於五代末年，但主要活動以及仕進的時間，橫跨了宋代初年太祖、太宗、真宗前三朝，這三朝的對外政策，正歷經了一個由盛至衰的漸變過程，尤其以詩歌題旨來看，宋時麟州應在陝北一帶，為當時宋代的西北部邊界，考詩人生平曾兩次出任益州，分別為淳化四年及六年，正是太宗對契丹採取相對平和，不輕啓戰端的政策階段，同時也是後續一連串戰爭即將開啓的短暫和平時期。因此整體對外的政治策略，就明顯的影響了文人遠赴邊關的書寫主題，一方面延續著漢唐以來呈現苦寒風格情調，但另一方面，卻已是邊關無事，漸有悠閒的情致在詩裡產生。

這點可以看出，詩人描繪邊境所選取的主題，或寫入的意向，很難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政策的變化會順勢帶動邊塞題材，進而發展出不同的面向。這樣的書寫模式，雖未在當時成為邊塞詩的主流，卻已有不同於漢唐的邊塞詩主題，並且可與宋代後來誕生的使北詩，以及元、明、清等後續由主觀轉為客觀的脈絡，理出一條發端的線索。

再如宋庠²⁰的〈關外〉：

關外崢嶸歲，河邊寂寞洲。寒雲能不雨，高柳強先秋。野靜狐狸出，沙長雁驚留。登臨雖信美，無賦可銷憂。²¹

全詩同樣從詩人自身出發，點出自己正處於大有可為的年紀，但卻身處關外，暗示無法在這樣美好的年歲裡貢獻自己的心力，開創一番事業，對應身處的關外景

²⁰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2冊：「宋庠（996-1066），字公序，原名郊，入仕後改名庠。仁宗天聖二年進士，初任襄州通判，召直史館，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左正言、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樞密使，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深為仁宗親信。……英宗即位，改知亳州，以司空致仕。治平三年卒，年七十。諡元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卷188，頁2145。

²¹ 同前註，頁2207。

色，更是一片靜默蕭條。前二句直接說明全詩的主題要旨，三、四兩句銜接年歲空過，而身不得用的意義。藉描繪邊景的柳樹已看出秋季的來到，且暗示寒雲已至，季候就要轉向凋零的節氣，後直接寫出野外之靜，只有狐狸出沒，營造低調安靜的氛圍。至末二句，則使用王粲登樓的典故，扣回前二句所點出的題旨，而此時的詩人心境正如王粲一般，懼怕年歲空過，登臨雖有美景，卻也帶來時間的焦慮，甚至哀嘆自己沒有王粲一般的文采，可以以賦銷憂。

宋庠生於太宗末年，主要活動的時間為真宗至英宗年間，為仁宗時的進士，彼時澶淵之盟已定，宋朝歷經了多次與契丹之間的戰役，由太祖時期的屢屢獲勝，到太宗時期的北伐失敗，再至真宗抵禦契丹南侵，在勉強得勝的情況下，簽訂了不利於宋的澶淵之盟。至此，後繼的仁宗皇帝，已無再戰之心，甚至待虜有禮，兩國之間已有頻繁的遣使往來，但此時邊塞的平和靜定已與太宗時期有所不同，太宗時期猶有北伐收復燕雲之心²²，但歷經數次失敗，宋人的民族自信心，自此已大打折扣。

因此詩人運用邊塞題材，所展現的已非開拓邊境的雄心壯志，更不是邊塞的官閑無事，而是帶著一份個人的憂慮苦惱。若回到當時政治情勢來看，無論詩人是否曾親身履及邊關，其透過想像所描寫的指向性，或親身至邊塞感受書寫的所見所聞，即已先受到政治方向的侷限，朝向既定的路向發展，而與政治情勢和民族信心相互呼應。整首詩的主題聚焦在自身的憂慮，邊境的清寒景致也僅是作為襯托存在，更遑論開疆闢地，建功立業之決心，宋初的邊塞詩從此走向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主題發展，隨對外政局方向所產生的主題偏移，直接影響了表現情調。

從上述的資料分析，可以獲知幾項訊息，其一，即邊塞題材的書寫，恆受文人立足的政治情勢所影響。其二，五代末至宋初邊塞詩，已逐漸與漢唐產生極大的不同。其三，即使是受到書寫傳統影響最深的邊塞樂府，至宋初時，在書寫主題上，仍有部分作品展現靜定的風格，戰爭元素在這些作品中大幅被削弱。這三項特點，雖非所有宋初邊塞所共同呈顯出來的風貌，卻已開啓後來邊塞由主觀轉

²² (宋)方勺著：《泊宅編》：「韓魏公判大名府，被旨修大內，於一堂中得壁記，乃太宗詩一首，意屬燕雲。」吳文治等主編《宋詩話全編》第1冊，頁429。

向客觀，由熱血轉向靜定，由家國之憂轉向個人之憂，其書寫的格局相對減小，與後來宋詩發展出重理致平和的詩風或可相互呼應。

（二）華夷之別的深化過程

華夷之別的現象之所以產生，除了立基於文人對中原文化的政治認同之外，也與生活型態的地域性差異有所關聯，因自然環境產生了生活型態的分野，造成游牧型與農耕型的民族生活方式不同，中原一帶的政權自古以來，就與北方邊境民族，在此不同型態的分野下進行著對立、融合、交流等活動。隨著時序的推進，華夷有別的概念，在文學的表述中，逐漸澱積成文人之間相互認同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因應著當時時代的政治情勢或文人立場，華夷之別或深化為優劣偏執的判斷，或華夷分別的色彩淡化，用以說明皇恩浩蕩，四海一家的概念。無論是上述哪種情況，都是在華夷有別，這一前提脈絡下所產生的變化。因此張高評在〈使遼詩之傳承與邊塞詩之開拓〉一文中提出，華夷之別到了北宋使遼詩中，遂成為一種華夷優劣的偏執，北宋使遼詩人把屈辱隱痛轉變為自大優越意識，在文學作品中刻意自我美化。²³張氏一文將此一偏執的來源，歸因於燕雲十六州未能收復，而使遼詩人親履本應是中原的界域，則自然感慨遂深，而有偏執之詞。

若以此概念觀照宋初邊塞詩的華夷之別，其整體尚未如張高評所論到達偏執的地步。從唐五代末年到張高評所論的北宋中後期，應有一段轉換或加深華夷之別的時期，但又未如北宋中期的華夷之別已至偏執的地步。況且，若將研究範圍放大到所有撰寫邊塞的詩來看，則使遼詩所書寫的，亦僅是其中一個面向，尚不能代表整體邊塞詩的發展。因此將華夷之別的漸變過程彰顯出來，正可以補足過去五代到宋初邊塞詩研究的空缺。事實上，唐五代到宋初邊塞詩中的華夷之別，仍延續著以「禮」為區別，以「中原民族」與「非中原民族」來做區隔，華優夷劣的偏執語境，應是北宋慶曆以後才較為明顯。

²³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使遼詩人有屈辱，需排釋；有隱痛，需緩解，於是把目光投注在宋朝文明的現實優勢上。此種因屈辱隱痛轉變而來的自大優越意識，往往表現在華夷優劣的偏執上，如王安石、蘇轍所作……。」，頁 295。

這之所以與使遼詩有所落差，是由於使遼詩本身是一個創作主體親履實地的移動過程，同時也是國家所賦予的使節任務，創作使遼詩的文人，不得不時時回到當時的政治情勢下書寫，隨著書寫者的出使路線，創作者一路所見所聞，一面帶來文化衝擊，另一面則加上國家優越的文化意識與歲貢求和矛盾心理融合，則產生華優夷劣的偏執。但若將考察範圍擴大到邊塞詩，書寫者本身未必有具體的移動路線，文化差異的衝擊相對減小，沿用過往歷史陳跡以虛設情境說理較多，或只是透過想像，寫出使北地所面對的種種差異，虛構的成分增加許多。這個時期，對於華夷之別只是分別，優劣的偏執雖尚未產生，卻已有逐漸加深華夷之間分野的現象。

宋初的華夷之別尚不深刻，亦未如北宋慶曆以後以偏執的目光審視北方異族，但卻已略顯端倪，如尹洙的〈皇雅大鹵〉、〈皇雅帝制〉就顯示出政治擺盪兩端，而展現了自我矛盾的心理。〈皇雅〉為南朝雅樂，樂譜為沈約所制，全為四言句式，主要作用為上呈帝王，是一種政治意味濃厚的應制詩。這類詩歌往往最能反映當時的政治形勢，透過在下位者的知識份子，揣摩在上位者的所預期看到的作品，可以觀察到當時國家主要對外的整體心理。如，〈皇雅大鹵〉：

冀州之疆，粵惟大鹵。俗伎而專，地扼而固。協比幽都，蕩搖邊圉。三垂既夷，兇威弗沮。帝御六師，百萬貔虎。剪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梯衝如舞。蠹爾孱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願究吾武。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鮪，復為王土。晉郊既平，九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昔武王，于商觀兵。維我藝祖，亦勤于征。匪貸晉罪，俟厥貫盈。聖作聖繼，巍巍相承。皇矣二后，功莫與京。²⁴

這首詩主要在歌詠宋太祖伐晉，晉即是石敬瑭在五代末年建立的後晉政權，而後晉政權對宋最大的影響，即是割讓燕雲十六州等地，造成契丹的興盛，成為宋初

²⁴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卷230，頁2695。

時最大的外患。作者在題下自註：「王師討晉罪也。」表面看來是寫宋太祖的軍隊如何收服後晉，一統九州。但其實是暗中譴責後晉「協比幽都，蕩搖邊圉」，而後晉與契丹又難以脫開關係，因此在應制詩上寫太祖收服後晉，應是暗指現今皇恩浩蕩，而邊疆四海因此保有和平，同時也以自我安慰或誇大的方式，向上位者說明宋朝國力之盛大。則外夷在詩中所扮演的，就不是需要被征伐的角色，而是相互換取和平的盟友，而這和平的來源，並非因宋朝弱勢怯戰，而是宋朝有軍事武力可征服後晉，暗示同樣亦可安定契丹騷擾的邊境。

這樣的意識在另一首〈皇雅帝制〉更為明顯，如：

帝制萬邦，罔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格三方，稽顙獻珍。單于革心，願交使人。帝謀公卿，列侯庶校。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複利吾寶。無若勵兵，襲其還道。皇曰有眾，予實念茲。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疇能盡之。益俾餘醜，毒吾朔陲。乃愈其盟，北州以綏。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暴農算商，經用弗充。中士震騷，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於穆聖考，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人遂來。逮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²⁵

這首詩主要表述的，即是中原民族的強大，透過對歷史的描述，過往功業的展現，向皇帝說明中原民族在過去可使四夷來服，其中包含著一定程度的自勉自勵，同時也替當時的政治局面做了開脫之詞。這首詩的敘述層次共分為三層，第一個層次以帝國既立，而蠻夷戎狄等異族尚未完全屈服為開端，但由於漢民族的皇帝威格三方，故異族遣使來朝。第二則是在異族遣使來朝的情況下，諸臣仍質疑異族狡詐，懷有其他用心，故主張用兵。第三個層次，則舉出過往歷史用兵於異族，但並不能獲得較好的成果，因此兩邊保有平和，息兵休戰，與民休息，才是真正的仁政。

至此，在這首詩中，華與夷之間雖有區別，但「夷」顯然已非需要被征服，

²⁵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4冊，卷230，頁2698。

被攻略的一方。反映出彼時的文人，礙於自身國家的軍事武力不如契丹，遂轉化在詩中對夷族的區別，已非「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征伐對象，而是在「仁」的概念統攝下，化爲四海一家，和平相處的敘述模式。故宋初華夷雖然有別，但亦不至於如張氏一文所分析，直接進入華優夷劣的偏執語境，而是具有一漸變轉化的歷程，才演進至使遼詩中的偏執。

另一方面，宋初文人延續著舊有的華夷之別的概念，區分我族與異族，其中形成華夏民族與夷狄分野的具體內涵，有一部分是有禮與無禮的區別，這概念至後來的使遼詩，甚至到南宋的使金詩中，逐漸被擴大成一種特殊的文化優越意識。在宋初邊塞詩中，此一概念被寫入以顯兩者之別，已可以在梅堯臣的作品中發現一些端倪，只是此時尚未如使遼詩人刻意強化之間的強烈差異，如〈送呂沖之司諫使北〉：

虜人多竊朝廷禮，譯者交傳應對辭。羊酪調羹尊漢使，氈堂舉酒見闕氏。
矍矍白日穿雲出，漉漉黃沙作霧吹。知去燕京幾千里，胡笳亂動月明時。²⁵

該詩由虜人多竊朝廷禮爲開端，除了意指雙方禮俗不同，更深一層所暗示的，即是虜人即使有自我的禮俗，也想向更高的文化他者學習禮的內涵。詩人在一開始的敘述，顯示他所認知的中原文化，是更勝於北方異族的文化，站在文化優越的制高點，開始鋪排後續的詩意，而寫入譯者則顯示兩邊在語言使用上的落差，更顯華夷之間文化的不同。後寫虜人以羊酪、調羹款待漢使，而氈堂則是少數民族的君王接待使者的大氈帳，闕氏是單于之妻的統稱。這裡描繪了一幅異地民俗的風景畫，後再寫矍矍白日，一片茫茫黃沙之景，則之前的文化優越視野，並未融入批判，而是轉向了客觀寫人、寫景。梅堯臣本身並未出使至邊境，而是透過想像的方式，構築了一幅兩國使節交流的塞外風景圖。可能因創作者本身未至北地，不曾親履宋朝未能收復的失土，同時更可能因彼時與契丹交好，雙方息戰休戈，

²⁵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5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卷258，頁3248。

因此華夷之別的主觀批判尚不明顯，但已可知梅堯臣的立場，仍是站在文化優越的角度虛構想像，這點在後來的使北詩中，才被徹底強化為優劣偏執。

再如其〈送祖擇之學士北使〉也顯示出相同的概念：

燕山常苦寒，漢使涉窮臘。路長人馬愁，風急沙霰雜。宿造氊廬開，行逢獵騎合。獻鮮禿髮馳，問譯華言答。每食冰生盤，欲飲酒凍榼。見其酋長時，國禮何勤納。中朝厚仁恩，四海望闔闔。乃知日月光，照必蠻夷匝。歸來易輕裘，賜對延英閣。²⁷

該詩透過對邊地的想像，綜合了中原文人對邊境的知識性認知，以苦寒的邊地氣候寫起，風沙、氊廬、以及四處行騎的獵人，這固然是當時北地邊境自然人文的景象，但同時更代表了未出使文人對北邊的虛構想像，以既定的意象撰寫邊景，甚至梅堯臣描寫的邊境實景，與後來的使遼詩的內容甚為相近，可說中原文人的虛構性書寫，逼近了有實際出使經驗的紀實見聞，這樣的一致性描述，也如前文所論及的，替後來邊塞詩轉向客觀描景提供了基礎。其所述除了氣候、邊景的差異，對使者入胡受到的接待，更呈現了士人階層對異族的想像與期待。

梅堯臣在後半以想像的方式，書寫我方漢使在見到對方君主時，禮節繁複殷勤，與異族拉開了差異，因此文人的文化優越感與華夷的區別，一部分是來自於有禮無禮的差異。後再歌頌宋朝皇帝的仁恩，有如日月光華一般，照徹四海，使得蠻夷皆可受到恩惠，呈現了一種自我滿足式的頌揚心理，這點無論在應制用的〈皇雅〉或是梅堯臣私人寄答文人的詩，均有所顯示，可見是當時文人的一種共通心理趨向。

結合上述所舉的例子來看，此時的華夷之別，在詩中呈現出來的，具有兩點特質，第一是因軍事武力的衰弱，在面對歲貢政策的層面上自我合理化，認為兩國休戈才能獲取最大的利益，且美化息兵休戰是因宋朝皇帝的仁心仁政，而非國家武力不如夷狄。第二，則是中原文人在描寫出使行程，以想像的方式構築一種

²⁷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5冊，卷259，頁3279-3280。

文化優越，除了以北地風景民俗的不同顯示差異外，更以有禮與否區別他者的具體文化內涵，進而在詩中的陳述佔據了我方文明高於對方的位置。這兩點現象在進入使遼詩的書寫後，則演化為稱頌雙方休戈政策的色彩漸淡，刻意彰顯文化優越的意識漸濃，才逐漸形成張高評所說華夷優劣的偏執。

綜合本節以上兩個小點所論，五代至宋初的邊塞詩在主題的呈現上，受到國家政治的影響，因對外戰事的屢屢失利，使得宋代文人對外的民族自信心一挫再挫，在本來以征伐異族為主軸的邊塞書寫，轉向為描繪北方大漠的自然風景，以及由想像虛構北方民族接待漢使的殷勤場景。過去開疆闢土的豪氣已逐漸消失，轉向呈現邊塞平和靜定的風格，或藉邊地蕭條之景，用以自敘心中的愁苦，戰爭的元素則在此時大幅度被削弱，反而轉向陳述「休戈」、「無事」等現象。邊塞詩的本質，其起源以及題材的劃分，本與政治息息相關，更受到國家政策走向的影響，由上述的分析，可見到宋初由於對外政策走向內斂而乞求和平，邊塞詩的書寫主題亦隨之轉化為內向平和，描寫荒漠的靜定，同時也隨著國家政策而自我合理化君主的作為，大幅的降低戰爭的元素，轉而歌頌和平方才是最大的利益。這對文人心理形成了一種自我矛盾，當創作者面對邊塞題材時，即產生了一種自我拉鋸，而呈現為分判華夷文化上優劣的偏執意識，凡此種種，皆在五代末至宋初埋下了邊塞詩主題轉變的要素，與後來的使遼詩，乃至南宋的使金詩，有了相對應的脈絡。

三、寫作手法的開拓

宋初邊塞詩的寫作手法，順應表達主題的不同，帶動了表現方式的差異，形成了重客觀記敘，重景物描寫，以及詩中融入議論等特點。這些特色與後來所謂的宋調質性較為相近，與宋初的白體、西崑、晚唐等詩風相去較遠。概由於邊塞題材本身即具有描寫北方邊地的需要，邊疆的自然物候，向來是邊塞詩與其他題材有所區隔的要素，同時又因國家政策使書寫主題發生變化，創作者需合理化國家對外政治的走向，卻又必須面對民族自信心帶來的矛盾拉扯。這讓原先就需要描實寫景的成分加重，客觀紀錄路程以及胡地民俗的分量變多，戰與和之間的議

題，也成爲創作者所關心的部分，使得宋初邊塞詩包蘊了部分宋詩與唐詩不同的特質，具體化爲敘實寫景，以及融入對戰爭思考之議論。敘實寫景的部分，則化爲後來使北詩的紀事性需求，而對戰爭議題的評價，則顯示出詩人的議論性思考，本節即分析上述所提到的兩個小點，以顯示宋初邊塞詩的寫作手法中所蘊含的特質。

（一）紀實性的增加

在寫作手法上，宋初邊塞詩在敘述方面，已嶄露出紀事性的增強，所謂寫景敘實並非指詩人在寫作上，完全客觀如畫一般將所有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而是透過對人物的選擇，適量自然景象的描繪，有意識的納入詩的編排，使其指向詩人所欲表達的意旨。宋初詩人強化了邊塞詩對紀事性的需求，使詩的敘述偏向了散文化的特徵。詩人透過有意識的抉擇，將所見事物經過篩選，以紀事性的手法描繪邊境，表面上看似客觀書寫，實際上是透過增強對邊地實物的描寫，將自身對國家對外政策的看法，隱藏在這種寫作方式的背後。此一紀事性增強的現象，具體影響了後來的使北詩，同時也可發現，宋詩的議論性及敘述實景的特質，在宋初邊塞詩中已有所表現了。

較爲人所知的代表作是范雍〈紀西夏事〉²⁸三首，范雍爲真宗年間進士，以其生平來說，歷經宋遼交戰到澶淵之盟，再到仁宗的與遼通好，宋朝在這段時間的主要敵人雖然是契丹，但亦可見范雍透過書寫黨項人所建立的西夏，來警醒宋在邊境戰事的弱化，而其在詩中使用的敘述方式，即是先以標題說明紀事性，再用記敘的口吻，有意識的呈現邊關事物，隱藏了詩人背後所欲表現的主旨。如〈紀西夏事〉其一：

²⁸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3冊：「范雍（981-1046），字伯純，世家太原，祖葬河南，遂爲河陽人。真宗咸平初進士。三年，補洛陽主簿。……仁宗即位，歷兵部員外郎、戶部副使、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陝西轉運使。天聖四年（1026）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六年，爲樞密副使。七年，加給事中。明道二年（1033）罷知陝州。寶元二年，以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爲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後知河南府。慶曆六年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卷153，頁1736。

七百里山界，飛沙與亂雲。虜騎擇虛至，戍兵常忌分。嘯聚類宿鳥，奔敗如驚鷹。難稽守邊法，應敵若絲棼。²⁹

這首詩在語言的使用上偏近白話，甚至在開頭首句，並未如一般五言詩在單句的陳述上，以上二下三的敘述方式開展，而是以「七百里」、「山界」類近散文的敘事方式為起頭，後再以飛沙與亂雲接續，此二句皆非依照傳統五言詩的句式頓點方式書寫，近似於散文的長短不等句式。會造成這樣的現象，一來可能出於紀敘性的需要增多，二來可能是詩人在搭配詩題〈紀西夏事〉的紀敘性而有意為之，無論何者，皆造成了句式在閱讀上的不等，而略具散文的特質。

整體說來，除了作者在前二句展現了這樣的安排外，後續的句式則又回到五言詩傳統的敘述方式。但在描繪邊關人事時，作者選取了虜騎時常趁虛而入來侵擾，以及鎮守邊疆的官兵有如散沙一般不守紀律的模樣，以實際紀錄說明邊關將士紀律鬆散，而北方西夏又有不臣之心，因此宋朝將士在迎擊來敵時無法有效防守，顯示邊地問題難以收拾。全詩幾乎為白描直敘，除了在五、六兩句使用了譬喻的方式，但亦僅止於簡單敘述邊地將士如散沙奔逃，並未使用太多繁複的修辭方式。

作者加強詩中紀實性的描述，將自身對邊關的憂心暗藏於後，並未跳出來直接議論，而是以呈現事實的手法，引導讀者做出朝廷對邊關戰事過於鬆散，且漠不關心的判斷。同時也可使讀者在閱讀後，增加對邊境的憂心，凸顯外敵侵擾的問題。

再如〈紀西夏事〉其二及其三：

承平廢邊事，備預久已亡。萬卒不知戰，兩城皆復隍。輕敵謂小醜，視地固大荒。願因狂狡叛，從此葺邊防。³⁰

²⁹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3冊，卷153，頁1736。

³⁰ 同前註。

劇賊稱中塞，驅馳甲鎧精。昔惟矜突騎，今亦教攻城。伏險多邀擊，驅羸每玩兵。拘俘詢虜事，肉盡一無聲。^{③①}

在范雍另外的兩首詩中，雖然在主觀陳述方面較為明顯的表現了自身的觀點，但基本主軸仍是建立在對邊關人事，進行寫實描繪的基礎上，展現邊防廢弛鬆散的情形，敘述敵我雙方面對軍事的態度積極與否，藉此建立落差感。如〈其二〉敘述我方對邊患的視角，是因承平過久，已久無預備邊防事宜，再舉出兩城防坍塌未曾修補之景。甚至紀錄職掌邊塞軍職的將領，輕敵而不治軍下。作者先由我方寫起，以實景樓台的坍塌，以及將領輕敵這兩個方面，呼應目前邊地已至「萬卒不知戰」的情況，直至最後，才表露出希望邊境有人來犯，如此才能引起朝廷重視的意圖，作者價值觀的判斷，亦是建立在對邊地紀事性的描繪上。

另外一首〈其三〉則主要紀錄敵方的狀況，透過對敵方言行的敘述，彰顯西夏是有意識的在進行騷擾，藉此提升危機感。劇賊應指西夏，中塞則是賊之勁悍者，顯見敵人的自信與實力，范雍在這基礎上，繼續描述對方鎧甲武器之精良，戰鬥策略不斷提升。過去只以騎兵作戰，現在卻開始研究攻城的方法，且開始有效運用策略，以伏擊攔截的方式進行作戰，甚至被我方擒捉到的賊人，都能夠至死不透露任何情報。范雍將敵人的特質一一具體描述，對比我方不知戰鬥，而對方似在有意識的情況下不斷提升，顯示出危機感。這三首詩主要描寫的方式，都是透過對人事景象的具體書寫，進而陳述作者背後所要表達的意義，以看似客觀的紀錄性質，包藏作者隱含憂心的主旨。

再如刁約^{③②}的〈使契丹戲作〉紀實的成分大量增加，主要紀錄出使契丹的所見所聞，幾乎無詩的意境可言，較類似以短語的方式，紀錄他在進入契丹後，見到不同於中原地區的官名、物質、食物等，如：

^{③①}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3冊，卷153，頁1736-1737。

^{③②} 同前註：「刁約（994-1077）字景淳，潤州丹徒人。仁宗天聖八年（1030）進士，歷諸王宮教授。寶元中為館閣校勘。慶曆初與歐陽修同知太常禮苑，為集賢校理。……嘉祐初使契丹。」，卷177，頁2021。

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³³

該詩幾乎不帶詩人的主觀意見，以及其價值判斷，僅是記錄差異，而這首詩的設計，亦未考慮詩的意境或修辭的優美與否，僅著眼於事物的紀錄。事實上，宋人已注意到這首詩所具備的紀實特質，如李頎《古今詩話》：「刁約使契丹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皆紀實也。」³⁴這首詩使用了許多特殊的名詞，押燕為陪伴賓客，移離畢則是契丹官名，有如中國的執政官，守門者的官名則是賀跋支，類似於中原的執衣防閣。匹裂則是形狀小口大腹，外緣漆上黃漆的木罐，故所謂餞行三匹裂，則是以三瓶這樣的木罐載酒以餞行，而密賜十貔狸，則是以狄人視為珍膳的黃鼠肉為贈禮。全詩由紀實性的名詞構成，將異地不同於中原文化的官名、物品名、動物名寫入，甚至不帶文化優劣與否的價值判斷，亦不牽涉和戰之間的問題，這樣的紀實性寫作，漸漸成為使北詩的一大特點，而這特點在真宗後的仁宗年間，就已有明確的表現。

另一方面，即使在沒有出使經驗的文人身上，書寫邊塞有關的題材，手法也盡可能朝記敘寫實的方向邁進，如梅堯臣〈送謝舍人奉使北朝〉：

漢使下西清，胡人擁道迎。寒笳隨宿堡，衛甲出孤城。犯雪貂裘重，衝風錦綬輕。山川辭國遠，車騎踏沙行。授館氍為幄，供庖酪和羹。戎王拜天賜，虜帥伏名卿。紫塞千烽靜，黃雲萬里平。甘泉歸奏日，重見鳳池榮。³⁵

如前所述，梅堯臣本身並未出使至北方，因此書寫的內容並非親身經驗，是透過對使北者至北方的想像撰寫而成，這樣的想像往往也反映了創作者對北地的期待，以及對邊境異族的理解程度。但即使是想像的邊塞異族，以這首詩的寫作手法而言，仍盡量以趨近實景細節的成分構築，雖然不如上述幾首來得真切貼近，但梅

³³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3冊，卷177，頁2021。

³⁴ （宋）李頎著：《古今詩話》，吳文治等主編《宋詩話全編》第2冊，頁1280。

³⁵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5冊，卷238，頁2764。

堯臣似乎盡力朝細節的描述上著手，寫出使者出使胡地過程中受到的種種待遇。

作者先寫漢使準備下榻到邊塞廂房中，接受異族政權的招待，路程中，胡人擁道歡迎漢使前來，接著從樂器為其演奏，甲士陪伴使者出城，而邊塞的風雪落在衣服上，使得貂裘感到更重，猛烈的風更吹動飄揚的錦帶。利用視覺、觸覺、聽覺各方面統合而成，構築一幅出使的場景，使其盡可能的逼真。接著再寫胡人居住的帳幄，與飲食方面的乳酪和羹湯，這方面雖不如刁約直接用異族稱謂寫出來得真實，但應已是梅堯臣身處中原，以想像的方式，所盡可能趨近的刻畫了。

後再言見到異族的王公貴族，因天子的禮賜感到拜服的場景，從此休兵息戰，不再有烽火，使者也完成任務回到朝廷，最終享受榮耀。全詩從漢使至邊塞出城開始描寫，從詩中可以看出，作者著力於邊境場景的構築，以不同的感官感受到的部分，組合成一幅邊塞風景，雖然在後半對胡人的居住處及其飲食的描寫，多由傳統累積下來的刻板印象寫成，但卻可以看出，作者通過盡可能對細節逼真的刻畫，寫出贈與他人出使的作品，增加了描景記敘的成分，即使是出於想像的邊塞，此時也與實際出使邊境者的書寫，朝向一致的方向發展。

通過對上述作品的分析，可以發現宋初邊塞詩在寫作手法上，對邊塞人事物的實景有了更為具體的描繪，無論是具有實際出使邊塞經驗者，或透過想像構築邊塞者，兩者皆朝紀實寫景的方向加重成分，這替後來的邊塞詩帶來了幾項特徵，一來是詩人建構趨近現實的場景，將自身對國家對外政策的看法包融於其中，以紀實寫景、寫人的部分，組合成引導讀者做出價值判斷的要素，這點無論是范雍的〈紀西夏事〉表現出對邊塞守備的憂心，或是梅堯臣以此虛構想像，呈現希望兩國以和為貴的期許，加重紀實性的成分似已成了必要的手段。二來則是這樣的做法，使得詩歌融入了散文的紀實性特質，這點尤其在具有實際出使經驗者，或實際鎮守邊關者特別明顯，這樣的寫作手法降低了創作者在詩意、詩境的美感營造，轉向紀事性的描繪，使詩擁有了散文的特點。

（二）議論性的加重

邊塞詩本身的特質，與國家對外的政策走向息息相關，而一個政體的對外策略，無非是攻伐他者或建立盟交，或利用異族稱臣的方式，達到獲取利益的效果，

而這種種策略也帶來了民族間的融合與交流。邊塞題材的表現也受到當下政策及創作者本身的民族傳統影響，知識分子以詩作為對政策之評議，亦成為邊塞詩向來表現的主軸之一。但相較於漢唐邊塞詩，宋初邊塞詩在寫作手法上，較偏向以議論直接說理，與少部分的形象思維結合，直接明確的表達創作者本身對邊塞政策的價值觀，或說明對戰爭行爲的思考。宋詩以議論表達主旨的特色，在宋初的邊塞題材中，亦可以略見端倪。這一類的作品展現了冷靜思考的質素，將戰爭帶來的痛苦，放到更大的哲理脈絡檢視，而非著眼於國家利益，或民族信心建立與否的問題，而是以人性觀照戰爭所帶來的傷害。如郭震³⁶的〈老卒〉：

老來弓劍喜離身，說著沙場更愴神。任使將軍全得勝，歸時須少去時人。³⁷

這首詩的描寫對象，不從將相王侯等人物著手，而是將書寫的重點放在小人物身上，卒是戰爭場域中階級最低者，邁入老年的兵卒更顯示出無力的特質。全詩幾乎為白話議論，說邁入年老的兵卒，早已遠遠的離開弓和劍一類的武器了。作者形容，聽老卒說起沙場往事，更顯出衰老與傷心，後半兩句則全為說理，道出即使將軍大獲全勝，全軍返歸時，人數必然少於去時的人。點出了戰爭無論輸贏，任何一方都不是真正的贏家，將勝敗家國等議題，暫時放置一邊，回歸到更大的人性關懷脈絡思考戰爭。考察全詩的寫作手法，作者雖寫老卒，但對於老卒的外部形容，並無多加描繪，而是直接切入正題，由老卒說起沙場事，帶出作者議論的主旨，後兩句的即使將軍全勝之語，亦無形象思維的圖景經營，這首詩的議論性質明顯壓過了圖景式的表達，以簡單明確的語言切入觀點，帶來了不同的寫作手法。

再如另一首魏野³⁸〈過古戰場〉，該詩議論的特性也相當明確，在寫作手法

³⁶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1冊：「郭震，字希聲，號漁舟先生，又號汾陽山仁，成都人。太宗淳化四年詣闕上書，言蜀將亂，後隱居。」，卷21，頁303。

³⁷ 同前註，頁304。

³⁸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2冊：「魏野（960-1020）字仲先，號草堂居士，陝州陝縣人。一生不仕，居陝縣東郊。」，卷78，頁892。

上，雖然對於外在風景形象略有描繪，但終非本詩所主要運用的方法，如：

戰死掩無墳，生降恥負君。古今魂易弔，貴賤骨難分。狐兔迷莎徑，烏鳶噪隴雲。誰家有征婦，曾此待回軍。³⁹

這首詩表現了同樣的議論性特徵，首聯先以戰死與生降相對應，指出戰死者曝屍荒野，但若生降又有負君命，以議論的方式引發作者的感慨。頷聯再說弔祭古今來今往之魂雖然容易，但死於戰場上的白骨，卻是難分貴賤，同樣領受了死亡到來的命運。前二聯均用說理議論的方式，切入對於戰爭的思考，至頸聯才引入在古戰場當下的外物場景，以狐兔、烏鳶象徵人事遷變的荒涼感，最終只有自然事物留下來，戰爭的原因及理由，早已是模糊難辨了。最後二句再以對話詰問的方式，說出也許有出征軍士的妻子，曾經等待他們回去。全詩除頸聯將視角拉到古戰場的野地景致之外，幾乎全為口語式的議論直述，明確表達了作者的觀點，使將士效命戰死沙場的悲劇，被提高到憫人的情懷上看待。議論入詩的方式，為作者帶來了敘述的便利，利於以直截的口吻陳述主張或觀點，但也帶來了形象描述弱化的缺點。

以詩陳述對戰爭思考的觀點，同時又兼顧了形象化的思維的作品，較佳的是錢易⁴⁰〈南兵〉，以口語的方式開頭，確立了全詩的主旨在於表達征伐之苦，再以兵卒受苦的圖景鋪陳開來，結合了以直截口語切入觀點，再以圖像化的方式為觀點的佐證，良好的結合了議論思維與形象思維，如：

曾見南兵苦，征遼事亦如。金瘡寒長肉，紙甲雨生蛆。山小蓋霜骨，河枯腫腐魚。黎元無處哭，丁戶日相疏。⁴¹

³⁹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2冊，卷86，頁960。

⁴⁰ 同前註：「錢易（986-1026），字希白，錢塘人。吳越王錢俶子，錢昆弟。」，卷104，頁1184。

⁴¹ 同前註，頁1187。

此處的南兵應指南漢，由首聯直接陳述主旨，點出將士因戰爭所必然面臨的痛苦，透過作者曾見過與南漢作戰軍士的慘烈情況，推知征伐契丹也是相同的情況，歸納了戰爭就會帶來痛苦的共通本質，已將全詩的主要觀點陳述完畢。後再以具體的景象細部描寫，以支持自身的論點，敘述邊疆軍隊已生了金瘡，而以硬布裱骨做的簡單護甲，也因下雨而長出蛆來。再言將士飲食之差，只能吃植物的莖骨，以及由於河流乾枯，僅能以腐爛的魚肉為食。後再轉入議論性的敘述口語，指出百姓欲哭無淚，而家家戶戶的人口也越來越稀疏，與首聯相互呼應，表達反對戰爭的意圖，整首詩的構成有主旨觀點，有形象化的圖景舉證，並且首尾敘述相連呼應，借重了將士戍守之苦，飲食之差作為應證有戰皆苦的觀點，則更添撼動人心的說服力。

上述三首皆為反對戰爭所做，以議論性為主，形象圖景為輔，表達對戰爭的反思。但另一首范仲淹⁴²的〈河朔吟〉則是以敘述議論的方式，說明自己收復燕雲的雄心壯志。當時范仲淹年三十，有燕趙之行，遂寫下這篇作品，以議論的方式，抒發自身對守土戍邊之事的看法：

太平燕趙許閑遊，三十從知壯士羞。敢話詩書為上將，猶憐仁義對諸侯。

子房帷幄方無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袴襦兵得帥，禦戎何必問嚴尤。⁴³

范仲淹這首詩，主要表達安定邊關需要以仁義為優先考量，只要任用官吏得當，使邊塞民豐物饒，在守將驅遣得宜的情況下，自然不必發對動外戰爭，而邊境也不會戰事連年，永無休止。全詩雖融入用典，但幾乎全為議論，首句從自身閒遊開始寫起，並想到自己年已三十，應當替國家做出貢獻。接著說自己認為具備詩書素養的人，則堪為上將，因其能以仁義為優先考量，以此治理軍隊與邊境。在

⁴²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第3冊：「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吳縣人。幼孤，母改嫁長山朱姓，遂名朱說，入仕後使還姓更名。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仁宗朝仕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卷164，頁1857。

⁴³ 同前註，卷166，頁1880。

用人得宜的情況下，更有如得到張良、李牧一般的人物，邊境可以無事，人民得以耕桑，如此一來，人民得到善待地方的官員，將士得到足以統帥全軍的人物，對於邊境則再也不必像嚴尤那樣，以軍事力量主動出擊匈奴。

全詩將典故納為舉證的論據，以此彰顯作者認為只要知人善任，並在政策上通行仁義，邊境就能得以安定的主旨。作者將典故連接到遙遠的歷史空間，納為自身論述比喻的依據，張良、李牧象徵一文一武，暗示在知人善任的情況下，挑選出文武兼備者，即可以使民豐物饒，而亦無須像王莽新朝時的嚴尤，為征伐異族的討穢大將軍，雖能征善戰，但最後卻在投奔劉聖後也遭逢兵敗被殺的命運。以歷史典故舉出正反例子，佐證其論述方向的正確性，作者雖言閑遊燕趙，但其中幾乎無邊塞景緻的描繪，反而是以議論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於國家政策的看法。

透過以上幾首詩的舉例分析，可以見到宋初邊塞詩，以議論性的手法，展現了對戰爭反思的意旨，將戰事置入人性的脈絡觀照。與宋詩後來的發展相比，共有兩項特徵值得注意，第一項特徵是，這些作品顯示了理性思辨的一面，作者幾乎嘗試跳脫「外族必得征服」的主題論旨，以更為人文理性的方式思考戰爭的本質，這顯示了後來宋詩理性化的部分端倪。第二項則是以議論的方式表達題旨，隨著理性題旨的表現需要，宋初邊塞詩漸以議論的方式直接切入，不做過多的情景交融，或是形象思維的圖景化描述，而是針對主軸論點，直接敘述，議論的成分提高，宋詩的議論化特徵，在宋初邊塞題材的描寫中，也見到了部分的表現。

詩歌向來為中國文人表現自我，或發表對國家政治意見的社會性產物，尤其與邊塞有關的作品，更容易受到國家對外政策發展的牽連，而影響了發展的脈絡及表現的方式。因此邊塞詩的內涵，恆受政治條件影響，或顯或隱的表達了文人對當時政治時局的看法，並搭配詩歌寫作手法的演進，呈現出不同的表達方式。透過考察宋初邊塞詩的寫作手法，可以見到呈現雙線的發展現象，從隱晦的一面來看，作者通過對現實場景的重新建構，而不直接融入個人評議的作品開始出現，無論有無出使北地或鎮守邊關經驗的文人，已開始進行此一方式的創作，並在這一類的作品中，加入了散文化的特徵，原先對於詩歌的美感經營，轉向了有如散文般紀事性的描繪，其本身所欲傳達的價值觀，亦隱藏於幕後，以所紀之事與場

景建構，引導讀者作出判斷，故其雖詩意美感的經營較少，但仍隱含詩人評論時事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在顯性的表達層面上，詩人以理性觀照戰爭，不作太多塞外風情的敘述，直接明確的切入主旨，以直白的語言議論戰爭帶來的悲劇，以這一類的作品來說，議論性的成分提高，對景物的書寫降低。這兩條路線的發展並不相悖，這反而呈顯了宋初邊塞詩蘊含了多元並陳的詩學元素，以及替未來詩風的發展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基礎，宋初邊塞詩的議論性寫作手法，以及散文化的紀事性特質，更可能與後來的宋詩形成內在的脈絡，顯示宋初詩壇其實包蘊了更多的可能。

四、結論

綜上所述，經本文對宋初邊塞詩進行分析後，獲得兩個層面的研究成果，第一，以宋詩的發展史而言，宋代詩學重視平和理致的表現，及以議論為詩的特色，在宋初邊塞詩的部分作品中，就已經具備了這兩項特質。邊塞詩雖恆受政治變動影響，卻最能反映處於當時政治局勢的文人心態，因此宋初邊塞詩隨著軍事力量的弱化，出現了平和靜定的風格，偏重描寫塞外閑散蕭條等景致，戰爭的元素在這一類的詩中幾乎消失，創作者的視角轉向了邊塞的另一個方向，排除戰亂與羈旅，邊塞的自然風貌也有了重新被創作者審視的可能。在寫作手法方面，詩的形象思維成分降低，議論性的表現開始出現，創作者直接陳述對戰爭的看法，偏向敘事說理。意境美感經營的成分降低，融入類近散文的表達方式，這與後來宋詩以議論為詩的特點，或能相互呼應，連接成相續的脈絡。

第二，就邊塞詩的研究史而言，藉由論述範圍的擴增，將所有與邊塞有關的作品納入考量，考察到華夷之別的心態，並非一開始就表現為強烈偏執，而是有一漸進的過程，以及隨著出使活動增加，描寫異域的作品增多，文人在敘述中自然地佔據文化的話語權，展現我族優於異族的意識，最終至衍伸成使北詩華夷優劣的偏執，補足張高評提出華夷之別的特點在宋初的空白。同時也發現紀事性的書寫方式，隨著出使異國與鎮守邊關的文人變多，紀實書寫的作品也相對增加，無論是在中原內地的虛構經驗者，或具有塞外實際經驗者，都朝向紀實性的方向

發展。詩人將行經邊關所見的景物寫入，紀錄的性質強化，以描繪實景的方式引導讀者做出判斷，而不出面直接議論時事，這部分可視為後來使遼詩與使金詩，寫作手法一脈發展的先聲。結合以上兩點成果，可以發現宋初邊塞詩包含了相對多元的可能性存在，許多後來在宋詩中成為主流的詩學風格，在宋初邊塞詩中已經可以略見端倪。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 司馬遷：《史記》(臺北：萬卷樓圖書，2010年5月)。

(宋) 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年10月)。

(元) 脫脫等撰：《宋史》(臺北：中華學術院，1972年11月)。

吳文治等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傅璇琮、倪其心等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

二、近人論著

(一) 專著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2月)。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台北：里仁書局，2008年6月)。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

何寄澎：《總是玉關情——唐代邊塞詩初探》(台北：聯經出版社，1978年6月)。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4年11月)。

閻福玲：《漢唐邊塞詩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8月)。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ontier Movement and Writing Techniques of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Liang, Ping-Gu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ng Dynasty, examines the theme of the shift of the foc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technique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ontier fortress poetry in Song Dynasty, there are two main directions. First, in terms of theme, the poems on the frontier fortifications in Song Dynasty have been mainly works in the style of expressing calm and static style. The creators' perspective has shifted to the other directions of the frontier. Excluding war and escort, the frontier's natural landscape has been re- Creator may examine the possibility. In addition, in other works, creators occupy the right of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poem and show the superiority of my tribe to the alien ones. Eventually, the creators' paranoia is extended to make the poem the pros and cons of North China. Second, as far as the writing technique is concerned, the composition of poetry thinking is reduc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argumentative and documentary realism begins to emerge, which integrates the expression of similar pros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ter poems of Song poetry, Good news for the expression of tactics, or can echo each other, connected

into a continuous context. It shows that the frontier poetry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contained the possibility of relative pluralism. Many of the later poetic styles that became the mainstream in the Song poetry can be seen slightly in the frontier poetry of the early Song Dynasty.

Keywords: Song Dynasty Early Years, Frontier Poem, Hua Yi Difference, Controversial, Documentary